

语言学与诗学译丛

Tzvetan Todorov

POÉTIQUE

诗 学

〔法〕茨维坦·托多罗夫 著

怀宇 译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语言学与诗学译丛

Tzvetan Todorov

POÉTIQUE

诗 学

〔法〕茨维坦·托多罗夫 著

怀宇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学 / (法) 托多罗夫著; 怀宇译.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语言学与诗学译丛)

ISBN 978-7-100-12082-1

I. ①诗… II. ①托… ②怀… III. ①诗歌研究
IV. ① I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5066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语言学与诗学译丛

诗 学

(法) 茨维坦·托多罗夫 著

怀 宇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2082-1

2016年8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4 1/4

定价: 15.00元

Tzvetanean Todorov

Poétique

© Editions du Seuil, 1973.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15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Divas International, Pari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根据法国瑟伊出版社 1973 年版译出

语言学与诗学译丛

编者前言

自从20世纪初西方出现“语言学转向”以来，语言已成为哲学、诗学、美学以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前沿问题，从语言角度研究文学，从语言学、语言哲学角度研究文学理论的“语言学诗学”亦成为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理论中的重要领域。尽管在“语言学转向”之后又出现了这样那样的转向，但并没有使“语言学转向”成为历史的遗音，相反，这各种各样的转向都可以从语言学转向找到根据，并使语言学转向在更为深广、更为基础的层面上继续发挥作用。人们对语言问题之所以会有如此持久的热情和兴趣，不仅在于20世纪初西方哲学领域出现的“语言学转向”这一重要的思想事件，而且亦由语言本身的性质和地位所致。我们知道，语言既是我们生存的空气又是我们存在的方式，既是最基本的文化现象，又是最基本的文化载体，既是构成文学的最基本元素，又是文学最直接的存在方式，语言无论什么时候都理应是文学、文化研究的基本问题。雅各布森在《语言学

与诗学》中曾经说：“一个对语言的诗性功能充耳不闻的语言学家，和一个对语言学问题漠不关心、对语言学方法所知甚少的文学研究者都同样是不能容忍的不合时宜之人。”雅各布森的这一陈述虽然是在50年前做出的，但时至今日，仍对我们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我们知道，西方文学理论学界，自从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把语言学与诗学研究相结合以来，历经捷克布拉格学派，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和后结构主义，以至今今天盛行于英美和欧陆各国的文体学、叙事学研究，把语言与文学，语言学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结合起来的努力一直处于持续发展的状态。1980年，“国际诗学与语言学协会”（简称PALA）在英国成立，其宗旨就是要推动语言学与诗学的交叉研究。这个学会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学术活动，每年举办一次年会，并拥有一份国际性的专业刊物《语言与文学》（*Language and Literature*）。除《语言与文学》这一会刊外，1972年，由伊顿·特雷弗（Eaton Trevor）创办的《文学语义学》（*Journal of Literary Semantics*），也旨在推进语言学与文学之间的交叉研究和探索。而近些年来在西方欧美学界兴起的语言与文学、文化之间“界面”研究（Interface Studies），也是运行在这一理路上的。

与国际上语言学与诗学研究的繁荣局面相比，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和译介则显得冷清得多。虽然我们的古人早就说过：“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序》），“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刘勰《文心雕龙》），“文之作也，必得之于心而成之于言”（孙复《答张洞书》），都认为“语言”是诗文得以“成”“立”

的根据，都认识到语言与文学、文化甚至文明的关系；虽然中国学界也有不少学者从事文学语言学或语言学诗学方面的研究，并产生了一些有分量的重要成果，但相对于中国这个庞大的学术队伍来说，相比于国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和语言问题本身的重要性来说，我们在这一领域投入的力量还显然不足。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一些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方面的文论选，并且陆续有一些结构主义和叙事学方面的译作问世，对推动当时的中国文学理论界对语言学诗学的关注，以及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方法的革新无疑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对于这个在西方文论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并且今天仍在持续发挥重要作用的文学研究领域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正是鉴于国内学术界在语言学与诗学研究和译介方面的这一状况，我们主持编选“语言学与诗学译丛”，以使这一未竟的事业得以持续、深化和发展。

本译丛从翻译20世纪以来的语言学与诗学研究方面的经典理论家的经典作品开始，再逐步向涵盖更广的、当今时代的语言学与诗学研究领域的优秀作品延伸。所遴选的篇目涵盖俄国形式主义、捷克布拉格学派、法国结构主义、言语行为理论以及文学阐释学这几个与语言学和诗学研究关系最为密切的领域中的经典或优秀之作。通过这套译丛，希望能对国内学界“尚未完成”的语言学转向，尚未充分展开的语言学与诗学研究有所推进或助益，并能对更深入地理解当今的一些文学、文化研究现象提供可能的语言学路径。

我们知道，在语言学转向之后在西方学界又出现了“文化转向”、“空间转向”等等多种转向，但这些转向并非意味着“语言

学转向”以及与之相关的语言学与诗学研究已经失去当下意义。文化转向、空间转向都是与语言观念的诗化、审美化转向相联系的，它实际上也可看作语言学转向的深化、扩展和延续。西方传统的哲学语言观强调语言的逻辑和语法本质，如果从逻辑的角度看语言，文学与非文学，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就势必成为不同的东西。但随着语言观的诗化、审美化的转向，人们逐渐抛却了往日的对于语法和逻辑的虚妄信念，不再从逻辑和语法，而是从诗、文学、艺术或修辞解释语言的本质。如果一切语言都具有修辞本性，都是诗，是文学，文学将不再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它将与所有用语言写成的文化文本交织汇融在一起。文学既然失去了明确的边界，文学研究自然也疆界难守，并从而拓展成了一种宽泛的文化研究。这便是“文化转向”得以发生的内在语言逻辑。同时，在西方哲学文化传统中，对于语言的逻辑和语法本质的强调又是与一种线性时间观相联系的，反对语言的逻辑和语法本质，势必又导致对于线性时间观的批判和质疑，从时间化向空间化的转向也就顺理成章了。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化研究、空间研究等都不是对语言研究的摈弃，而是一种“内化”或“转化”而已。这也使得，当人们从语言学角度切入这些研究领域时，便会更有效地切中问题的内在机理。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套“语言学与诗学译丛”中的“语言学”不是在严格的学科意义上使用的，它既包括“语言学”，也包括“语言哲学”。“语言学与诗学”研究也因此是“语言学、语言哲学与文学理论”的交叉研究领域，而这一领域显然不是一个封闭的王国，也不是形式主义研究的代名词，相反，它

是一种开放的、具有极强辐射力和增生力的研究领域，语言与哪些现象有关系，“语言学与诗学”研究就与哪些现象有关系。如语言与心理、语言与存在、语言与符号、语言与修辞、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也决定了语言学与诗学研究关涉这些领域。同时，对于语言学与诗学研究来说，西方学者一方面从语言角度研究文学或对文学语言进行专门研究，从而生成一种“原生性”的“语言学诗学”理论，如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等；另一方面也对这些“原生性”的语言学诗学进行“继发性”研究，从而形成一种“继发性”的“语言学诗学”，如乔纳森·卡勒的《结构主义诗学》等。无论是“原生性”还是“继发性”的语言学与诗学研究，都可能由于它们所依据的语言学、语言哲学基础或选取的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研究谱系，如语言形式诗学、语言文化诗学、语言存在论诗学、言语行为诗学研究等等。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语言学与诗学研究的增生性、开放性。这种开放性也决定了我们这一“语言学与诗学译丛”不是完成式的，而是开放性的。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译丛的筹划离不开南京大学周宪教授的关心、鼓励和支持。从译丛的最初提议，到篇目的最后选定，再到出版社的联系，周老师都给予了大量的无私帮助，译丛出版之际，特别向周老师致以最诚挚的谢意！译丛的编选还得到编者在英国伯明翰大学访学时的合作导师迈克·图兰（Michael Toolan）教授的帮助和指导，在这里也向图兰教授表示衷心感谢！与编者一起访学的学友，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赵明珠博士，也为译丛做了许多细致的工作，也一并表示感谢！同时

衷心感谢商务印书馆的大力支持！也感谢各位译者积极参与译丛的翻译工作，没有他们辛苦的劳动，该译丛的面世也是不可想象的。

赵奎英

2015年4月17日于南京

导 言

弗朗索瓦·瓦尔

编辑们的努力，带着某种必然的滞后，带着整个文化传播似乎都有的满足于吸收和获取近似情况的特征，这一特征近几年来得到了加强，为的是给结构主义一种总体的面貌——而在不久前还没有谁更有能力描绘这种面貌。正是怀着这种不大的决心，本书*的几位作者聚集在了一起：深信他们之间可以相互学习，几乎也深信“外行”读者会从他们那里学到东西。

甚至就在结构主义具有科学志向和其研究工作不属于意识形态而属于理论范畴的情况下，在其对于各种材料的发掘中，它也只能依靠作品——即依据现场——来获得理解：在此，对其做总体的论述只不过是一种瞎说和吹嘘。最终，还必须考虑到，在被其搞乱了的已经死亡的人文“科学”领域内，结构主义的贡献

* 托多罗夫的《诗学》原是《何谓结构主义》(*Qu'est-ce que le structuralisme*)一书的第二部分，其余四个部分也与此分册同时以单行本出版。——译者

之一，是否就在于并非禁止不具备专业人员严格性与责任意识的东西。

然而，概述就不能在另一层面即方法层面上有所作为吗？如果结构主义这个词能够说明某种东西，那恰恰是由于在处理符号的科学中采用了全新的提出问题和探讨问题的方式：这种方式是根据索绪尔的语言学起步的。读者在下面看到的阐述，就属于这一方面。

但是，我们不能立即就说，方法只有一个，而且是简单的：我们需要考虑，这种方法在何种情况下并非每一次都由其对象所特定（过去，人们相信，同一种超验的道理在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就可以说明最为多样的对象，现在，我们毕竟不处在那个时代了），在何种情况下，它对于每一种对象都是明确适用的（我们后面遇到的某些困难，就与人们把由不同对象所支配的多种处理方式统为一体或混乱使用有关系）。因此，有关结构主义的定义，几乎每一次都是在介绍之末才得以出现。

我们把问题反过来说：结构主义存在吗？答案在不久前似乎是明确的；今天，我们愿意谨慎一点再做出回答。难道我们不曾阅读过乔治·冈吉莱姆*所写的文章《结构方法论》（假设真正存在着这样一种方法¹）吗？从这种变化来看，我们现在的论述，由于并不是提前考虑好的，也就成了一种更引人注目的阐释了：不

* 乔治·冈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 1904—1995）：法国哲学家和著名认识论学者。——译者

1 《批评》杂志（*Critique*, n° 242, juillet 1967, p.602）。

从可以说是结构方法的一种先验的定义出发，随后触及它在这里或那里的使用情况，而是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学科来研究这种方法是否已经变化和在何处发生了变化，并研究这种变化在哪个方面说明了我们应该称之为结构主义的东西。

我们聚在一起，是为了写作《何谓结构主义？》。我们现在发表的¹，最好称为《论知识的最新变化和将其汇总为结构主义的东西》(*De modifications récentes du savoir et de ce qui les rassemble comme structuralistes*)。对于轴心的这种位移，人们不该将其看作是一种倒退或是某种不确定性的标志：关键更在于（几位作者在此聚会是很说明问题的）后来出现的诸多问题；这便是，当人们不再为一种研究才去发明革命性工具，而是为实践这种研究、测知这种研究的各种困难及其也许与现实一样多的限制条件、为看到这种研究在没有与之断裂反而使之突显的连续知识沿革中找回自己位置的时刻，所出现的那些问题。这是真实的，并且被看作是真实的，尽管——正像后面多次出现的那样——这里不是在沿用一种已经建立的科学话语，而是在过问使某些迄今尚未得到很好确定的认识领域之成为科学的可能性。

我们还是坦率地说吧：在有人就结构主义向我们提出问题时，通常，我们不理解他要跟我们谈什么。首先，在一片蛙声鼓

1 请参阅同一丛书，第44种：奥斯瓦尔德·迪可鲁瓦（Oswald Ducrot）著《结构语言学》（*Structuralisme en linguistique*），第46种：堂·斯派贝尔（Dan Sperber）著《结构人类学》（*Structuralisme en anthropologie*），第47种：穆斯塔法·萨福安（Moustafa Safouen）著《结构精神分析学》（*Structuralisme en psychanalyse*），第48种：弗朗索瓦·瓦尔（François Wahl）著《哲学》（*Philosophie*）。

噪之中有这样一种传言，即结构主义类似于一种哲学，它想取消许多好的东西，尤其是取消人。我们可以设想一下那些青蛙的动情景象：它们与那喀索斯（Narcisse）*一起分享水边的波纹。但是，在那喀索斯的故事中，人们之所以通过对其结构的论述可以获得某种结论，恰恰是因为，若他的面前没有其自己映像的话，他就根本不会在水中与树枝和水莲的映像待在一起，而且也因为这甚至仅仅是在需要了解（他肯定不会独自去做）这种映像依靠什么不在场的东西来形成、而它又在掩饰着什么缺位的情况下，那喀索斯才在自己缺位的时候可以以主体身份来出现。

我们会看到，这里实际上有某种东西进来了，这种东西可能像某种哲学，并且是我们时代思想的诸多重大赌注之一：但是，它并非就是这样来理解的结构主义。

从思想的另一端（这一次是从最低的方面）来看，结构主义只不过像是家庭餐桌上通常引起话题的一种有点怪味的菜肴。一种科学的成就（尽管还是非常零碎的！）竟把对它的讨论变成了连它自己都不知所措的一般观念：我们在此预告读者，在本书随后的所有介绍中，人们将不会看到哪怕一点点暗示。我们还须再一次指出，对于有关结构主义的一切说法，我们都几乎全然不知。

最近几个月，人们看到某些结构研究的开创者、甚至某些在前几年经常使用结构主义术语的人，已经把结构主义一词当作记者的一种发明将其放弃了，并且不敢再提其可能包含的各种联

* 希腊神话中爱恋自己在水中倒影的少年，在其憔悴死后变成水仙花。——译者

系，我们对此表示理解。实际的情况是，如果灵活地使用结构主义的诸多标签的话，今天，人们可以做这样的理解：有两种实证的结构主义（第二种指责第一种为经验主义），有一种只是理性的结构主义，有两种至少预告一种主体受到颠覆的结构主义（后一种指责前一种简约从事）；有一种古典意义的哲学在使用结构主义，而有多种结构主义却在自身排除任何哲学。曾经作为主角的结构主义，似乎正在变成重要的古典角色都来或几乎都来重新表演一番的舞台。

因此，我们尝试压缩一下我们的概述，而重申有关结构主义的介绍所应该遵循的界限。我们曾经说过，这里“只”涉及科学。但，是什么样的科学呢？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一部著名的著述中¹，曾规定了结构科学的目的在于“提出一种系统特征”，也就是说，提供一整套东西，而其一个部分在不引起所有其他部分改变的情况下，自身也不能改变。他提出了结构科学的操作工具：即建构模式。他也提出了结构科学的可理解性规律：即转换组群支配着模式之间的对等性，并且主导着它们之间的结合。如果我们必须坚持这种定义的话，那么，任何与结构观念有关的东西，换句话说，任何与理性诸多重大“形式”中的一种有关的东西，都将归入结构主义名下，这样一来，就应该从数学开始，中经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直到话语科学。这样的表达方式太扩大化了。它包含着一个认识论问题（这正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说法），但

1 《结构人类学》（*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第XV章，第306页。

是，它并不阐述知识的一种断裂¹对其刚刚起作用的那种领域的特征性。

我们要这样说，唯一不落入混乱的表达方式是，在结构主义的名下，汇集着有关符号和符号系统的科学。最为复杂的人类学现象都可以进入结构主义，但这仅仅因为它们借助了语言事实而被用在了 $\frac{\text{能指}}{\text{所指}}$ 这一系统的构成范围之内和准备进入交流网系之中，也因为它们就是从这里接受它们的结构。也许，对于所有的人来说，这是真的，但同样，对于所有的人来说，这又可能不是真的，而我们的介绍在后面遇到的困难又将找不到其他原因。至少有一点应该明确，我们需要认识的结构是：准备进入人们之间交流的结构，因为这些结构产生着意指，并且是至少在两个平面上分节式连接。我们不把一种直接处理对象的做法说成是结构主义的，如果那样就会弄钝了锋刃；这里涉及的仅仅是那些再现成分和再现活动自身所引起的东西。

因为在符号中，新的东西，并不是所指，而是其与能指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我个人就这样考虑）这样说，正是这种关系在决定结构主义。事实是，能指在迫使做这样的考虑，并且能指自身各种要求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是判定坚守结构主义名称的所有话语其彻底性的思路。但是，在今天看来，这种定义无疑还是过于狭窄。因为，如果对于符号两个层次的平行性再一次提出质疑的话，我们就会立刻被引导到（通过我已经提到的这个时

1 认识论断裂或从一种意识形态话语到一种科学的过渡：因此，是这种科学的一种诞生行为。但同样也是对诸多认知领域的一种全新界定意义上的断裂。

代给出的步骤，这种步骤带有某种哲学的东西，因而已不再仅仅属于科学，它甚至重新回到了我们对于科学所形成的概念上）使整个一系列“明显的东西”失去平衡：这就涉及或者是要说的东西先于正在说出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可能遇到字母出现在无意义地方的“不可想象”之事；或者是任何话语的一种载体以现在时所处中心的位置——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学会把任何中心的移动和起因的持续退缩看成是能指内在固有的；或者是以其所用语言来说话的主体的最后自主性——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可能发现能指的构成性作用，并发现也许就是在能指上存在着每位“主体”最难简缩的东西。我们将会看到，结构作为思维方式的选择链，并非只是依靠对它的研究，各种选择才得以进行。

不管怎么样，人们将会明白，结构主义是严肃的东西：对于归因于符号的一切东西，它都赋予其科学的权利。